

东北地区“江”名的历史由来考*

庄会彬

提 要：东北地区的“江”并非当地汉语自身发展的结果，而是东北地区历史、文化、社会、政治等多个因素不断交织的产物。历史资料表明，高句丽、新罗首先在中国东北地区、朝鲜半岛使用了“江”，后来的渤海，从高句丽继承了“江”，并将其推而广之，使得“江”在东北地区的分布格局初具规模。后经几番“江”“河”拉锯战，形成了今天的局面。当然，在东北地区“江”的形成过程中，汉字的使用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
关键词：江 东北地区 渤海 高句丽 汉字

中国河流名称总体上呈“南江北河”的分布格局。南方的河流多以“江”命名，如长江、珠江、赣江、湘江、浙江等；北方的河流则多以“河”命名，如黄河、淮河、海河、渭河、汾河、塔里木河等。然而，东北地区却是个例外，这里虽然地处北方，许多大河却以“江”命名，如黑龙江、松花江、嫩江、图们江、鸭绿江，等等。对于南方“江”名的由来，学界存在“外来说”和“汉语固有说”两种主流观点。以 Norman & Mei 为代表的外来说认为，“江”并非汉语本身固有的基本词，而是外来词，借自南亚语或者南岛语（古楚地百越民族语言）。① 王力②、张洪明③则持“汉语固有说”，认为“江”最初是指中国南方最大河流长江的专有名词，后来从专有名词转化为普通名词，用来指所有的河流。既如此，问题也就来了：东北地区那么多河流以“江”命名，又是如何而来？

一

东北地区的“江”名显然不会是由长江之专名的“江”扩散而来。要知道，东北地区远离南方，且两者之间中原大地上又有大小无数“河”流重重阻隔，这就注定了“江”无法穿越华北地区渗透至东北。那么，这些“江”是否会穿越空间而来——通过大规模的移民，要知道，移民可能会改变一地的语言乃至地名的。然而，根据历史文献记载，历史上大规模迁往东北地区的民众多是来自于北方地区，当然史书中也有江南人移往东北的记载④，且当时长江已开始以“长江”命名⑤，但其移民规模和影响力也有待进一步考证。如此一来，东北地区的“江”只剩下了一种来源：本地民族语言。可是，东北地区民族之多、语言之复杂绝非一篇文章所能说清楚

* 本文得到 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基于东亚语言词汇语音结构演变的语言学理论创新研究”（项目编号：19BYY001）支持。

① 参见 Jerry Norman and Tsu-lin Mei, “The Austroasiatics in Ancient South China: Some Lexical Evidence”, *Monumenta Serica*, vol. 32 (1976), pp. 274—301; 刘振前、庄会彬：《汉语“江”的词源辨正》，《山东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2011 年第 5 期。

② 参见王力：《谈谈学习古代汉语》，山东教育出版社，1984 年，第 210—222 页。

③ 参见 Hong-Ming Zhang, “Chinese Etyma For River”, *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*, vol. 26, no. 1 (January 1998), pp. 1—43.

④ 如《晋书》载记第九《慕容皝》记有以“吴人为吴县”，参见许嘉璐主编：“二十四史全译”《晋书》第 4 册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，2004 年。

⑤ 参见谭其骧：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 4 册，中国地图出版社，1982 年。

的。为做到有的放矢，我们依据两个原则进行考证：

第一，要考虑东北地区“江”最早出现的时间。

第二，如果说一种民族语言能够造成东北地区河流大批改名，这种语言必须有其强势，而在当时的东北地区，这种强势主要还是政治上的强势；通常而言，一个民族只有建立起政权，其语言才有强大的渗透力。

如此一来，我们需要首先确定东北地区“江”出现的大致历史年代，再围绕这个时代，考察当时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及其语言，从而找到东北地区“江”的由来。鉴于隋代之前东北地区的河流名称尚不可考（《中国语言地图集》中亦是留白），我们且从隋代考起。

《中国语言地图集》^①显示，隋代，东北地区的河流多以“水”“河”命名，如黑龙江当时称“完水”，嫩江（及松花江东流段）当时称“难河”（唐初称“那河”），松花江（西流段）当时称“粟末水”，辽河当时称“辽水”，鸭绿江当时称“鸭渌水”。可见东北地区出现“江”名，当是隋以后的事情。松花江契丹时期改称“混同江”^②。在辽代的地图中，黑龙江（同松花江汇流后段）已称“混同江”，鸭渌水亦改称“鸭渌江”。^③可见，最晚至辽金时期东北地区已有诸多河流改称为“江”。那么，“江”名是否来自女真（金）或者契丹（辽）民族语呢？就语言视角而言，这显然不太可能，因为女真（金）使用的语言与后来的满语相联系，而满语的江河读音为 üla、bira，与汉语的“江”读音相去甚远；契丹语虽已消失，但根据某些历史典籍，还能拟构其个别词的读音，有学者就把契丹语中“河”的读音拟构为 muren。^④这样一来，“江”来自于契丹语可能性也排除掉了。

二

有了以上考量，接下来，我们只需要考察隋到契丹（辽）之间曾经统治过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及其语言。隋与契丹（辽）之间，在东北地区建立起强大政权的少数民族只有靺鞨、渤海，且它们都使用至少一种民族语言。然而考虑到靺鞨使用的靺鞨语亦与后来的满语相联系，可以大胆地予以排除。如此一来，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渤海了。极有可能是渤海政权改变了东北地区河流的名称格局，依据有二：

首先，文献方面的依据。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显示，“涑沫江”“鸭渌江”最早出现在渤海国境内。^⑤由于缺乏文献记载，当时的黑龙江没有标识名称。黑龙江是不是在渤海国时代就已经命名为“江”了呢？不得而知。但清朝学者西清于1810年对其考证的结论是“至辽史始有黑龙江之称”^⑥，另外，《辽史·道宗本纪》中也使用了“黑龙江”^⑦，如果《辽史》撰者脱脱忠于历史之称，那么，“黑龙江”一名应该在辽时已经存在了。前面已经谈到，辽所使用的契丹语不会给汉语带来“江”，因此，“黑龙江”很有可能是渤海国命名的。

其次，从地域上看，当年渤海政权的统治范围包括黑、吉两省以及鸭绿江、图们江、乌苏里

① 参见谭其骧：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5册。

② 《松漠纪闻》记载：“旧云粟末河，契丹德光破晋，改为混同江。”洪皓撰，张海鹏订：《松漠纪闻正续补遗》，照旷阁，续部页5。

③ 参见谭其骧：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6册。

④ 参见王小甫：《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的关系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04年第4期。

⑤ 参见谭其骧：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5册。

⑥ 西清：《黑龙江外记》，台北成文出版社，1969年，第28页。

⑦ 《辽史》，中华书局标点本，2017年修订，第1册，第337页。

江流域，而今天东北有“江”的地域范围也大致如此。这一依据还从反面表明了东北地区的“江”应该不是契丹（辽）带来的，契丹（辽）的统治范围不止有黑、吉、朝鲜，还有辽宁、内外蒙古以及北方的广大地区，而且中心在蒙古，如果是契丹（辽）给黑、吉、朝鲜带来了“江”，那么辽宁、内外蒙古等也不应该例外。

三

假如说东北地区的“江”真是渤海政权的产物，那渤海政权的“江”又是哪里来的？渤海国的语言又是怎样的？要回答这两个问题，还要从渤海建国者大祚荣的身世说起。《旧唐书·渤海靺鞨传》开篇写道：“渤海靺鞨大祚荣者，本高丽^①别种也。”^②《新唐书·渤海传》记载：“渤海，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，姓大氏。”^③

既然大祚荣为“高丽别种”“粟末靺鞨附高丽者”，渤海国的上层统治者（在建立政权之初）很可能讲高句丽语^④，至少要受到高句丽的很大影响。这一点可以从至少两方面获得支持：一是金毓黻谈到，“渤海诸臣及遗裔之见著录者，高氏凡得五十余人，较他姓为繁，此又世族出于高丽之证也”^⑤。对此，白鸟库吉曾统计渤海赴日正使85名，其中有26名姓高，与高句丽国王同姓，其余的正使和副使多用汉族式姓氏，用满族者仅有6名。^⑥再就是史料方面，日本史书《类聚国史》卷193《殊俗部渤海上》延历十五年四月戊子（二十五日）条载：

真宗丰祖父天皇二年，大祚荣始建渤海国，和铜六年，受唐册立。其国延袤二千里，无州县馆驿，处处有村里，皆靺鞨部落。其百姓靺鞨多土人少，皆以土人为村长。^⑦

这里的百姓，指的当是渤海臣民，不包括奴隶。因为在奴隶社会，只有官吏、奴隶主以及平民才有姓氏。这说明，渤海国主体民族为靺鞨人。“土人”又该作何解释？史学界对此看法不一，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，如傅朗云认为“土人”是发人后裔^⑧；杨军认为“土人”是指渤海建国初期在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粟末靺鞨人^⑨；宋玉祥认为，此“土人”当作“土人”^⑩。无论如何，“土人”不会是普通的靺鞨人，他们要么是高句丽人，要么是随从大祚荣出生入死的靺鞨人，即“粟末靺鞨附高句丽者”。这些人一旦掌握了政权，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，难免要受到此前高句丽政权方方面面的影响，当然也包括地域河流的取名原则。

历史文献表明，高句丽应该是第一个在东北地区使用“江”的民族政权，如《中国历史地

① 本文中之“高丽”“高骊”均直接来自于古书的引文，皆为今天所指“高句丽”。

② 许嘉璐主编：“二十四史全译”《旧唐书》第6册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4612页。

③ 许嘉璐主编：“二十四史全译”《新唐书》第8册，第4728页。

④ 有学者认为渤海国的上层社会使用高句丽语，如维基百科上谈到：“据推测，统治阶层使用汉语和高句丽语而普通民众与地方多用靺鞨语。亦有看法认为渤海语事实上是含有靺鞨语词汇的高句丽语。其中亦可能夹有少数汉语成分。”<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B8%A4%E6%B5%B7%E8%AA%9E>。

⑤ 金毓黻：《渤海国志长编》，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，1934年版，第447页。

⑥ 参见〔日〕白鸟库吉：《关于渤海国》，《史学杂志》1932年第12号。

⑦ 参见〔日〕菅原道真：《类聚国史》，宽平四年（892）成书，梅阴书屋藏书。

⑧ 参见傅朗云：《渤海土人新释》，《黑龙江社会科学》1999年第3期。

⑨ 参见杨军：《渤海“土人”新解》，《北方文物》2006年第2期。

⑩ 参见宋玉祥：《渤海史研究中的三题小议》，《博物馆研究》2004年第4期。

图集》表明,唐朝前期,当“松花江”“鸭绿江”还叫做“粟末水”“鸭渌水”的时候,原高句丽辖地已经有了“乌骨江”^①。高句丽为什么会用“江”,而不是“河”呢?这可能与高句丽语自身的特点有关系。高句丽语的河流词发音与“江”的古音应该相似,证据为,根据学者们对历史文献《三国史记·地理志四》中地名的整理可以发现,高句丽语里的河流记为汉字“屈”音,与“江”的古音相似。^②而今天的朝鲜(韩)语^③里还保留着一个古老的河流词, karam (가람)^④,明显与上古汉语的“江”的读音 * kruŋ^⑤、* krooŋ^⑥相似。“屈”和“江”的古音虽然韵母差异,但声母相同(同为见组)。这种对音在古代多有发生,如藏文曾以 ne 对译“宁”字。^⑦同样的情况还见于越南语,越南曾用“究”记载越南语“江”,即 * krong。^⑧对于高句丽语与后世乃至今天朝鲜语之渊源,目前尚难以定论,但根据我国史书记载,新罗与百济可以通话,而百济语与新罗语也有些相似:“语言待百济而后通焉”^⑨(《梁书·新罗》),“今言语服章略与高骊同”^⑩(《梁书·百济》)。既然三国语言在梁代已是两两之间可以勉强通话,至于唐代相互交流应不再是问题。它们即使不是一种单一语言或者同一语系,至少也有过深层的接触。把今天的朝鲜语与历史上的高句丽语联系在一起应该是可以接受的。

另外,有些学者通过比较韩(朝鲜)文化与中国古百越文化,认为朝鲜文化的主体部分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,是中国百越文化的一支。^⑪还有学者从语言学角度,探讨了韩(朝鲜)语与中国东南沿海远古民族语言之间有着亲缘关系。^⑫

“江”为古越语中的普通河流词^⑬,既然朝鲜语与古越语有着亲缘关系,其河流词的发音很可能类似于“江”。更有趣的是,不只是高句丽倾向于用汉字“江”,与高句丽同一时期的新罗也对“江”颇为青睐。如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显示,唐朝初期,新罗境内也出现了“江”——“熊津江”^⑭;时至今日,朝鲜半岛上的河流一概称“江”。这些不应该都是巧合,而恰恰在说

① 谭其骧: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5册,第50—51页。

② 参见徐德源:《高句丽族语言微识录》,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》2005年第1期;张士东:《高句丽语自然物的语音和语义研究》,《湖南农机》2012年第7期。

③ 另外, Beckwith 曾尝试把高句丽语、百济语及现时的日语系诸语连系在一起(参见 Christopher I. Beckwith, *Koguryō: The Language of Japan's Continental Relatives*. Leiden: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, 2004.)。这一观点是否可信我们不做评论,但从他所拟构的高句丽语词汇可以看出,高句丽语应与中世朝鲜语以及现代朝鲜语有着紧密的联系。

④ 有学者认为: karam 为古朝鲜语的借词,借自上古汉语(见崔玲爱:《汉字学讲义》,汉城: tongnamu, 1995年)。这一观点尚值得推敲,有证据表明,汉语中作为普通河流词的“江”实非汉语固有词,而是来自于古越语,参见刘振前、庄会彬:《汉语“江”的词源辨正》,《山东大学学报》2011年第5期。

⑤ 参见李方桂:《上古音研究》,《新清华学报》1971年第9期。

⑥ 参见郑张尚芳:《上古音系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,2003年,第332页。

⑦ 参见周季文、谢后芳:《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》,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,2006年。

⑧ 参见刘振前、庄会彬:《汉语“江”的词源辨正》,《山东大学学报》2011年第5期。

⑨ 许嘉璐主编:《二十四史全译》《梁书》,第729页。

⑩ 参见许嘉璐主编:《二十四史全译》《梁书》,第728页。

⑪ 参见苑利:《韩民族文化源流》,学苑出版社,2000年;苑利:《从稻作文化看韩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》,韩国民俗苑出版社,2005年;蔡丰明:《吴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》,学林出版社,2006年;等等。

⑫ 参见苑利:《韩(日)语与中国东南沿海远古吴越语比较》(上、下),《当代韩国》2005年第2、第3期。

⑬ 参见刘振前、庄会彬:《汉语“江”的词源辨正》,《山东大学学报》2011年第5期。

⑭ 谭其骧: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5册,第50—51页。

明,古朝鲜语中已经存在类似于“江”的语音形式。如此一来,也就不难理解,高句丽在借用汉字表河流时,为什么没有选择“河”,而选择“江”了。^①

这里顺便说到,原来北方地区多以“水”命名河流,“水”为什么会退出历史舞台?这一点,我们曾有过专门讨论^②,主要观点是,“江”“河”有其民众土壤,而自有秦以降,雅言不断衰落,导致底层语言崛起。最终平民语言渗进上层社会的书面语,从而夺取了河流的命名权。东北地区“江”名的出现也正是应这一潮流而动。随着雅言渐趋式微,北方地区“水”退“河”进,南方地区“水”退“江”进,河流词“江”在中国南方已成大一统局面。^③潮流涌动之下,这一局面不免渗入地缘上相近的朝鲜半岛(如新罗出现了“熊津江”等),也影响了当时渤海国统治下的东北地区。渤海继承了高句丽的制度、文化、语言,其中自然包括河流词“江”。不可避免地渤海选用了“江”来命名自己境内的大河。^④根据近代学者黄维翰所纂辑《渤海国记》,目前可以确定,渤海国当时使用的“江”名已有不下10条,如鸭绿江、涑沫江、溟江、沸流江、乌骨江等^⑤,基本奠定了东北地区“江”的分布格局,给后世造成了深远地影响。

四

值得强调的是,在“江”的传播过程中,汉字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众所周知,汉字是音义二维性文字,它与语义的联系具有特定性,与语音的联系却不具特定性,因此可以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,有着较强的稳定性和穿透力。史料表明,渤海乃至当时整个东北亚地区的书写文字都是汉字。^⑥渤海用汉字“江”为河流命名,不仅很容易为内地汉族人所接受,也为当时以及后来东北亚各民族所接受,从而使得“江”名得以穿越时空,保留至今。

总而言之,历史上正是有了高句丽的尝试、渤海的继承和推广,再加上汉字的诸多优点,东北地区“江”的地位很快就得到了巩固和加强,后来的几个朝代的语言皆难以撼动。而汉字“江”正是以朝鲜半岛为跳板,假高句丽、渤海国之手传到了东北地区,此后的一千多年里,“江”与“河”几经拉锯(总体说来,“江”的范围基本维持渤海国的影响地域,个别地区“江”退“河”进,如“乌骨江”后来改名“绥河”),最终形成了今天东北地区“江”的分布格局。

(作者单位:河南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)

本文责编:周全

① 有人可能会怀疑 karam 与“江”之间的关系,因为在今天朝鲜语里和“江”对应的是 kaŋ (강),如鸭绿江的发音是 Amnok-kaŋ (압록강),而非 Amnok-karam。对于这一问题,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,一是 kaŋ 为借词(音),直接从汉语借来;二是 kaŋ 可能是由 karam 发展而来。基于以往的研究,本文认为,kaŋ 是由 karam 发展而来的。在这一过程中借词(音)也起了助推的作用:一开始 karam 的存在为“江”的进入提供了方便之门,后由于汉字读音逐渐标准化(汉化),最终读成了今天的 kaŋ。

② 参见刘振前、庄会彬:《汉语“江”的词源辨正》,《山东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11年第5期;布占廷、庄会彬:《汉语“河”的词源辨考》,《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》2010年第2期。

③ 唐人孔颖达在为“九江孔殷”(《书·禹贡》)注释时写到:“江以南,水无以大小,俗人皆呼为江。”

④ 事实上,东北地区的许多民族政权都对其境内的大河以自己的语言命名,如黑龙江历史上曾有蒙古语名“哈拉穆连”和满语名“萨哈连乌拉”,至于为什么这两个名称没有保留下来?答案或许非常简单:“穆连”“乌拉”毕竟这些不是汉语,而渤海国所采用的“江”有其汉语基础,则更容易接受并得到推广和继承。

⑤ 参见黄维翰纂辑:《渤海国记》,广文书局,1968年。

⑥ 由于文献资料传世不多,渤海的语言已无法再考,但有很多证据表明,渤海国官方书面语言是汉语。参见刘晓东:《渤海国语言初探》,《北方文物》2004年第4期。